

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研究*

崔 岩

【摘 要】 志愿服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研究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公众的价值观认知以及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的外部功利性因素、外部非功利性因素、内部功利性因素、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几个方面，对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进行研究。通过建立双栏模型，本文发现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国家层面与公众层面的价值观对公众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有显著影响。在志愿者中，志愿服务的实际效能评价与志愿服务的参与持续性高度相关，个人功利性考量则对志愿服务的持续性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提升志愿服务参与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 志愿服务 参与动机 双栏模型

【作者简介】 崔岩，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展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03 - 0098 - 18

一、引言

(一) 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研究背景

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我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较低，公众社会治理参与的制度和机制也不完善，这

* 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作者感谢项目资助，文责自负。

使得社会公众的参与渠道匮乏、参与能动不足、参与效能感不高。要提高社会的治理能力，必须建立健全公众的社会治理参与机制，实现社会治理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目标，从而实现社会治理中各方面资源的最佳配置。

志愿服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很多社会公众以志愿者身份自发加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成为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社会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是社会整体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公众个体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说，发展志愿服务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因此，应当深入研究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提供实证研究依据。

（二）对现有志愿服务参与研究的综述和分析

综观国外对志愿服务参与的研究，比较多的研究是从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的视角展开的。例如，有研究从志愿服务项目的模式设计、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意义感强化等方面分析了志愿服务的内在动力；^①也有研究从志愿服务的组织激励机制角度讨论了志愿服务持续性的问题。^②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学者们重点讨论了志愿者参与服务动机在个体心理层面的不同维度。例如，有学者对志愿服务是利他主义驱动抑或是利己主义驱动进行了分析；^③也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讨论了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是基于内因还是基于外因；^④当然，更多学者倾向于采用多维度视角对志愿服务行为动机进行分

① Gary D. Geroy, Philip C. Wright and Laura Jacoby,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Employee Volunteerism: An Aid for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r, *Management Decision*, Vol. 38 (4), 2000, pp. 280 - 287; Sanford E. DeVoe and Jeffrey Pfeffer, Hourly Payment and Volunteering: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on Decisions about Time Us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0 (4), 2007, pp. 783 - 798; Dane K. Peterson,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Volunteer Programs: Employees' Perceptions, *Personnel Review*, Vol. 33 (6), 2004, pp. 615 - 627.

② Lisa Cavallero, Corporate Volunteering Survey: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Corporate Volunteering Programs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nal on Volunteering*, Vol. 11 (1), 2006, pp. 65 - 69.

③ Michael B. Frisch and Meg Gerrard, Natural Helping Systems: A Survey of Red Cross Voluntee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9 (5), 1981, pp. 567 - 579; Boz Ismet and Palaz Serap,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otivation of Turkey's Community Volunteer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36 (4), 2007, pp. 643 - 661.

④ Valérie Millette and Marylène Gagné, Designing Volunteers' Tasks to Maximize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Job Characteristics on Volunteer Engag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 32, 2008, pp. 11 - 22.

析,认为同一志愿参与行为其内在动因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①其中,有学者提出将志愿服务行为的内在动机划分为价值表达、学习理解、职业发展、自我提升、自我保护和社会交往等维度,并通过创建志愿者功能量表(Volunteer Function Inventory,以下简称VFI),对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的内在心理动机进行测量。^②

与国外众多志愿服务参与的研究相比较,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正随着志愿服务参与的普及不断增加。在国内关于志愿服务行为动机的研究中,有学者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从利己型和利他型的视角进行更为细致的类型分析,^③也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对志愿服务的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建设进行了讨论。^④从研究方法来说,既有定量研究,也有质性研究。例如,有研究通过对志愿者进行访谈,分析了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结构变迁及其特征,发现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正在实现从以“责任感”为轴心的传统性动机向以“发展”为轴心的现代性动机和以“快乐”为轴心的后现代性动机的结构转型。^⑤也有学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将志愿者动机按从低到高的不同层次划分为功利型动机、被动型动机、快乐型动机、发展型动机和责任型动机。^⑥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采用了VFI对志愿者的内在心理动机进行测量和分析,对如何提高志愿服务的参与水平提出了建议。^⑦

① Allen M. Omoto and Mark Snyder, Sustained Helping without Obligation: Motivation, Longevity of Service, and Perceived Attitude Change among AIDS Volunte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8 (4), 1995, pp. 671 - 686.

② Gil E. Clary, Mark Snyder and Robert Ridge, Volunteers' Motivations: A Functional Strategy for the Recruitment, Placement, and Retention of Volunteer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Vol. 2 (4), 1992, pp. 333 - 350; Gil E. Clary and Mark Snyder, The Motivations to Volunte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8 (5), 1999, pp. 156 - 159.

③ 邓国胜、辛华、翟雁:《中国青年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与动力机制研究》,《青年探索》2015年第5期,第31~38页;卓彩琴:《志愿服务动机的深层分析》,《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6~40页;李玮、林伯海:《利己与利他关系视角下的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53~58、84页。

④ 刘俊彦:《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机制建设研究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第25~30、68页。

⑤ 吴鲁平:《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结构转型和多元共生现象研究——对24名青年志愿者的深度访谈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0页。

⑥ 王民忠、狄涛:《基于需要理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13年第10期,第61~64、87页。

⑦ 蒋巍:《中国志愿者服务动机结构研究——基于广东省志愿者的问卷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第59~65页;卓高生、孔德民、车文君:《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功能理论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4年第6期,第111~113页。

从现有的国内相关研究来看，研究重点主要是从个体出发的功能层面讨论志愿服务，研究对象也以青年群体为主。在研究中，除了从功能主义理论、个体需求理论，以及对年龄、性别、时间分配等因素的分析外，较少关注志愿服务参与者的社会价值观取向、志愿服务参与效能感等维度。^① 尚未有研究以全体社会公众为研究对象，对社会价值观取向与志愿服务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所以，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志愿服务参与中的参与决策阶段和参与过程阶段的不同内在动机进行讨论，并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框架，^② 重点从公众价值观认知以及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的外部功利性因素、外部非功利性因素、内部功利性因素、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几个方面对参与动机进行研究。

二、研究假设、核心变量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从公众的社会价值观认知以及志愿服务中的外部功利性因素、外部非功利性因素、内部功利性因素、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几个方面对志愿服务动机进行研究。在假设中相关概念的测量上，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9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中的公众志愿服务情况问卷模块中的问题。

首先，以往研究发现，对社会价值观的认知是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动机之一，正向社会价值观是促进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因素。^③ 志愿服务的内在驱动力是参与者个人的价值观与社会认知，个体因志愿服务与其内在认知高度一致而加入到志愿服务中，以实现和满足其内在价值体系的自我认同。^④ 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关于公众的价值观认知，主要采用了情景式问题和量表式问题，对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① 关成华、张佑辉、方航：《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志愿者？——基于时间分配视角的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7~137页。

② 宋辰婷：《共青团志愿服务中青年学生的参与驱动力分化研究——基于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现状研究（2016年）的调查数据》，《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6期，第26~33页；景晓娟：《重大公共事件中青年志愿者利他动机的研究——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青年志愿者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第51~54、9页。

③ 涂敏霞、魏万青：《城市青年志愿活动参与动机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8期，第63~69页。

④ 景晓娟：《重大公共事件中青年志愿者利他动机的研究——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青年志愿者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第51~54、9页。

情况进行了测量。使用上述变量,本研究分别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具体假设为:

假设1: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有更强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

假设2: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着正向的影响效应。

其次,以往的研究发现,志愿服务动机中既有功利性动机,同时也存在非功利性动机。^① 本研究对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功利性、非功利性因素的交互效应进行假设。具体来讲,内部因素主要是以内因为导向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包括功利性因素和非功利性因素两个方面。一般来看,内部功利性因素主要指志愿服务对参与者个体的提升作用。^②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志愿服务模块,对内部功利性概念的定义主要借鉴了国外的已有研究,重点从参与志愿服务是否有利于个体发展的利己角度进行界定。^③ 对于内部非功利性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指个体的政治参与行动、社会参与行动和政治参与效能感。例如,有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对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④ 所以,对该维度的讨论,本研究沿袭了以政治的社会参与视角讨论志愿服务参与中的“效能感”的分析主线,从个体政治参与效能感高低、政治参与情况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效应的角度提出假设。^⑤

外部因素则主要是指以外因为导向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同样包括功利性因素和非功利性因素。外部功利性因素主要指志愿服务对他人和社会是否具有实质意义和功利价值,以及参与志愿服务是否有助于个人实践和履行“公民责任”。正如有学者在对VFI的研究中,认为志愿服务给志愿者提供

① 赵琛徽、翟欣婷:《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提升路径研究——基于道德认同和志愿服务经历的作用》,《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221~233页; Jhony Choon Yeong Ng、赵斯琪、谭清美:《大学生志愿者志愿行为可持续性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6期,第33~39页; 乔桂强、张洪月:《高校学生参与国际活动志愿服务的动机研究》,《青年发展论坛》2019年第5期,第61~68页。

② Gil E. Clary and Mark Snyder, The Motivations to Volunte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8 (5), 1999, pp. 156-159.

③ Boz Ismet and Palaz Serap,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otivation of Turkey's Community Volunteer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36 (4), 2007, pp. 643-661.

④ 张冰、章晓懿:《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37~144页; 尚俊颖:《志愿服务与政治效能感——面向P大学本科生的调查研究》,《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6期,第42~53页。

⑤ 王新松:《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浙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204~209页。

了履行“公民责任”的机会，是志愿者参与动机的一个重要维度。^① 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志愿服务模块中，从志愿服务是否只重视形式、是否能取得实际成效的角度，对外部功利性因素进行了界定。对于外部非功利性因素，已有国内外学者从志愿服务组织的制度建设、团队建设等层面进行了分析。^② 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志愿服务模块中，该维度的概念界定主要沿袭志愿者是否出于对志愿服务组织各个方面效能的认同而参与到志愿服务中的思路，对志愿组织的对外机制（招募机制、资金支持等）和内部机制（项目规划、组织协调、人员素质和服务热情等）进行评价。^③

综上，针对前面提到的四个维度，本研究提出的具体假设为：

假设3：公众对外部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假设4：公众对外部非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假设5：公众对内部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假设6：公众对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二）研究数据和核心变量

1. 样本的基本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 PPS 概率抽样和入户 CAPI 问卷访问方式，共访问了 10000 多名称乡居民。^④ 在问卷中，除了基础变量，也包含公众的价值观测量模块、公众的

① 龙涛、张延平：《大型节事中志愿者参与动机的实证研究——以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为例》，《旅游学刊》2011 年第 4 期，第 66~72 页。

② Sanford E. DeVoe and Jeffrey Pfeffer, Hourly Payment and Volunteering: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on Decisions about Time Us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0 (4), 2007, pp. 783 - 798; Dane K. Peterson,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Volunteer Programs: Employees' Perceptions, *Personnel Review*, Vol. 33 (6), 2004, pp. 615 - 627; 刘俊彦：《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机制建设研究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25~30、68 页。

③ 刘敏：《志愿服务行政化问题探究——以广州 F 街志愿服务为例》，《理论导刊》2014 年第 3 期，第 24~27 页；詹国辉、张新文：《转型期公共服务的志愿性供给——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湖北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第 35~42 页；张冰、章晓懿：《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第 137~144 页。

④ 调查的抽样设计、调查问卷和加权方案等技术文件，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http://csqr.cass.cn/index.jsp>）。

志愿服务情况测量模块以及公众的社会认知测量模块。在公众的志愿服务情况模块中,了解被访者在最近一年是否参与了志愿服务。具体变量的基本描述分析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基本描述统计(样本量:10256份)

		全体 N = 10256	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N = 1733	未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N = 8525
变量	变量定义	统计	统计	统计
性别	百分比			
	女性	49.23	40.9	51.22
	男性	50.77	59.1	48.78
年龄	均值	41.90	37.57	42.93
受教育年限	均值	9.78	11.41	9.38
居住地类型	百分比			
	城镇	58.53	56.50	59.01
	农村	41.47	43.50	40.99
政治身份	百分比			
	中共党员	10.33	17.30	8.67
	共青团员	10.69	17.33	9.11
	民主党派	0.36	0.50	0.33
	群众	78.62	64.87	81.88
社会经济地位	百分比			
	社会上层	0.73	0.89	0.69
	社会中上层	6.23	8.87	5.60
	社会中层	40.76	43.86	40.03
	社会中下层	29.56	29.21	29.65
	社会下层	22.71	17.17	24.03
就业身份	百分比			
	工人	11.80	9.23	12.49
	农民	24.07	17.00	25.97
	私营企业主	1.37	1.93	1.22
	专业技术人员	8.89	14.23	7.46
	干部	3.67	6.86	2.82
	办事职员	7.31	10.93	6.34
	商业服务业人员	20.95	18.05	21.73
	自由职业	6.92	4.03	7.69
	在校上学	8.18	15.05	6.33
	退休	6.84	2.69	7.96

2. 研究假设中的核心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主要了解被访者是否参与了志愿服务，以及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长（以小时为单位）。

针对研究假设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分别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相应测量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采用情景式问题和量表对公众的价值观进行了测量，分别测量了被访者的社会责任优先意识和社会规范优先意识。首先，个体具有社会责任优先意识，是个体对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履行公民社会义务的内在心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是服务社会的前提和基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社会成员正确对待个体利益，纠正非理性行为和对自由的滥用，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内在凝聚和良性运行。

其次，问卷价值观部分还测量了个体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即在面对个人利益最大化情景时，个体是倾向于遵循社会规则抑或是依靠“关系”谋求利益。在社会行动中，每个社会成员以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才能得到维护，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如果“关系”取代“规则”成为社会成员行动的准则和谋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则会使社会无处不陷入个体私利和公众利益的现实冲突中，导致社会生活和道德面临诸多困境。^①所以，对社会规范的遵守体现了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追求，是社会价值观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对被访者认为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况进行测量。有研究表明，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情况与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有着紧密的联系。^②所以，调查问卷的志愿服务模块重点对公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进行测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③

结合以往研究，除了对价值观的测量，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还设

① Katherine K. Xin and Jone L. Pearce,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9 (6), 1996, pp. 1641 - 1658; 付群英、曹威麟、朱宁：《社会规范与私利需求对个体经济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软科学》2010年第2期，第135~139页。

② 龚万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视阈下的志愿服务》，《理论月刊》2009年第12期，第148~150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23/c64387-23924110.html>，2021年3月18日。

计了被访者对志愿服务各方面的评价模块。^①其中,和外部功利性因素相关的变量反映了志愿者对其所参与志愿服务的实效性的主观评价。对于外部非功利性因素,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从志愿者对志愿组织的认可水平角度出发,重点考察了志愿服务招募是否具有自发性、是否有稳固的资金支持,志愿组织在服务项目设计上是否有计划性、组织内部是否有有效沟通,志愿者是否有较高服务热情等维度。对内部功利性因素主要测量了志愿者是否认为其参与的志愿服务能有自我提升的价值;对内部非功利性因素则主要测量了个体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效能感。同时,在具体研究中结合我国当前志愿服务组织与动员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志愿服务发起类型进行了区分,主要包括个人/志愿组织发起、工作的单位/学校发起、社区居(村)委会发起、政府部门发起等形式。其中,个人/志愿组织发起的志愿服务可以考虑为自发型志愿服务参与,其他形式则更接近于动员型志愿服务参与。^②具体变量的操作化和描述统计见表2。

表2 模型核心变量描述统计(样本量:10256份)

变量	变量定义	全体	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未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被解释变量				
志愿服务参与(频次)	是否参与了志愿服务	10256	1733	8525
志愿服务小时(均值)	一共从事志愿服务小时	—	13.04	0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价值观认知(百分比)				
社会责任感				
社会利益认知	赞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比例	66.11	70.67	65.03
社会规范认知	赞同遵守规范优先于走关系比例	79.70	83.93	78.69

① 贺佐成:《基于社会资本的志愿者组织治理策略与措施》,《改革与开放》2019年第9期,第65~71页;许晓琴、谭震皖:《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区体育志愿组织的运行机制研究——以江阴市为例》,《体育研究与教育》2018年第6期,第48~50页;张晓红、王方颖:《高校志愿服务运行管理现状探析——基于2015-2016年度全国高校志愿服务调研》,《社会治理》2018年第9期,第67~74页;许莲丽、曹仕涛:《志愿服务支持型组织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北京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第84~90页。

② 朱晨光:《关于城市社区管理公众参与机制的若干思考——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学理论》2009年第5期,第116~117页。

续表 2

变量	变量定义	全体	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未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	认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最为重要	37.01	39.48	36.39
社会层面	认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最为重要	34.05	32.47	34.45
个体层面	认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最为重要	28.94	28.05	29.16
内部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志愿服务的自我提升评价	认为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不能获得个人成长	4.81	11.00	3.47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政治参与效能感	认为有知识和能力参与政治	51.60	59.21	49.71
社会参与行为	实际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	38.04	63.37	29.59
政治参与行为	实际参与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	41.41	52.76	37.63
外部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志愿服务效能评价	认为志愿服务只重视形式主义，没有实际成效	13.81	32.92	11.24
外部非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志愿组织的外在机制评价	认为志愿服务招募主要靠组织，没有自发性；没有稳固的资金支持	22.15	57.46	17.41
志愿组织的内在机制评价	认为志愿服务计划不充分，组织内部沟通不足，志愿者热情不足	16.69	41.57	13.27

(三) 研究方法

在对计次变量 (count data) 的分析中, 当样本中被解释变量存在一定比例数值为 0 时, 应使用审查回归模型 (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s)。^① 常用的审查回归模型主要包括 Tobit 模型、双栏模型 (double-hurdle models) 等。

在 Tobit 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有上限、下限或者存在选择性等问题。^② Tobit 模型实际上包含两部分估计, 一部分是反映选择问题的离散数据模型, 另一部分是受限制的连续变量模型。但是, Tobit 模型在归并模型的两部分参数估计中, 只能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 无法区分不同选择群体的异质性。

与之相对应, 双栏模型可以在不同部分模型中对影响因素进行差异化分析。^③ 双栏模型在建模中的个体决策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参数估计以虚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 第二部分则是在第一阶段条件下对连续型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参数估计。^④

具体而言, 双栏模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归并模型 (决策模型) 为:

$$D_i^* = Z_i\alpha + \mu_i, \mu_i \sim N(0,1), \begin{cases} D_i = 1, \text{if } D_i^* > 0 \\ D_i = 0, \text{if } D_i^* \leq 0 \end{cases}$$

其中, D_i^* 为潜在决策变量, Z_i 为影响潜在决策变量的因素。第二部分为:

$$Y_i^* = x_i\beta + v_i, v_i \sim N(0,1), \begin{cases} Y_i = Y_i^*, \text{if } D_i = 1 > 0, Y_i^* > 0 \\ Y_i = 0, \text{if 其他} \end{cases}$$

其中, Y_i^* 为潜在被解释变量, x_i 为影响潜在被解释变量的因素, μ_i 、 v_i 是随机干扰项, $corr(\mu_i, v_i) = \rho$ 。当 $\rho = 0$ 时, 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log(L) = \sum_0 \ln \left[1 - \Phi(z_i'\alpha) \Phi\left(\frac{X_i'\beta}{\sigma}\right) \right] + \sum_+ \ln \left[\Phi(z_i'\alpha) \frac{1}{\sigma} \varphi\left(\frac{Y_i - X_i'\beta}{\sigma}\right) \right]$$

其中, $\Phi(\cdot)$ 为累计概率分布函数, $\varphi(\cdot)$ 为概率密度函数。

① John Shonkwiler and Shaw William, Hurdle Count Data Models in Recreation Demand Analysi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Vol. 21 (2), 1996, pp. 210 - 219.

② James Tobin,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Econometrica*, Vol. 26 (1), 1958, pp. 24 - 36; 周华林、李雪松:《Tobit 模型估计方法与应用》,《经济学动态》2012 年第 5 期,第 105 ~ 119 页。

③ Murray D. Smith, On Specifying Double-Hurdle Models, in Aman Vllah, ed., *Handbook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1st Ed.)*, New York: CRC Press, 2002, pp. 535 - 552.

④ John G. Cragg, Some Statistical Model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 *Econometrica*, Vol. 39 (5), 1971, pp. 829 - 844.

三、基于双栏模型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分析 and 讨论

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志愿服务参与”从过程来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访者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第二个阶段是选择参与志愿服务的被访者，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小时数。该被解释变量是计次变量，样本中存在相当比例的数值为0，是典型的受限的连续变量。所以，本文使用双栏模型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基于双栏模型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分析

如前所述，Tobit模型存在的问题是其在归并模型的两部分参数估计中采用相同的变量，无法区分决策模型部分的不同选择群体影响因素的异质性。与之相对应，在双栏模型中则可以根据不同部分模型中影响因素的差异对不同的变量进行分析。

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责任和价值观认同是影响公众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因素，个体通过内在的价值认知和社会认同，选择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所以，在双栏模型分析的决策模型部分，本研究的核心变量是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被访者选择参与志愿服务时，影响其服务时长的分析模型为受限制的连续变量模型。这部分已经参加到志愿服务中的个体对志愿组织和志愿服务实效等的评价，则成为影响其服务时长的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受限制连续变量模型部分，主要是检验志愿者对志愿服务效能、志愿组织效能等的评价以及对其志愿服务持续性的影响。在这部分模型中，外部功利性因素、外部非功利性因素、内部功利性因素、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是受限制连续变量模型的核心变量。同时，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主观认知和评价性变量，均进行了统一正向编码调整，也就是取值越高，表示被访者越倾向于积极正向评价。

具体来看，双栏模型回归显示：在决策模型部分男性有更高的可能性参与志愿服务（ $\beta = 0.091$ ， $\rho = 0.008$ ）；随着年龄增加，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会降低（ $\beta = -0.005$ ， $\rho = 0.000$ ）；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与志愿服务参与呈正向关系（ $\beta = 0.045$ ， $\rho = 0.000$ ）。在模型分析过程中，笔者对年龄的平方项和受教育年限的平方项进行了检验，没有发现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志愿服务参与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曲线关系，所以没有加入到模型中。从职业类型分析，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高的可能性参与志愿服务（ $\beta = 0.326$ ， $\rho = 0.002$ ； $\beta = 0.261$ ， $\rho = 0.000$ ）。值得注意的是，在价值观层面，认同以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核心的国家层面价值观和认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公众义务和素质层面价值观的群体，有更高的可能性参与志愿服务（ $\beta = 0.065$ ， $\rho = 0.000$ ； $\beta = 0.058$ ，

$\rho = 0.003$); 与之相对应, 认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层面价值观的群体, 则对其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beta = 0.038$, $\rho = 0.055$)。本文对社会责任变量进行分析, 发现人们对社会利益优先意识和社会规范优先意识的认同, 均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beta = 0.145$, $\rho = 0.000$; $\beta = 0.143$, $\rho = 0.002$) (见表3)。

表3 双栏模型决策模型部分的回归分析

	β 值	标准 误差	z 值	P 值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常数项	-2.144	0.121	-17.719	0.000	-2.379	-1.909
性别 (参照组: 女性)	0.091	0.038	2.395	0.008	0.017	0.165
城乡居民 (参照组: 农村居民)	-0.110	0.049	-2.245	0.012	-0.205	-0.015
年龄	-0.005	0.001	-5.000	0.000	-0.007	-0.003
受教育年限	0.045	0.005	9.000	0.000	0.035	0.055
政治身份 (参照组: 非党员/共青团员)	0.285	0.046	6.196	0.000	0.196	0.374
职业 (参照组: 其他)						
工业制造业工人	-0.168	0.080	-2.100	0.018	-0.323	-0.013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0.100	0.064	1.563	0.059	-0.024	0.224
农业从业人员	0.074	0.054	1.370	0.085	-0.031	0.179
专业技术人员	0.261	0.075	3.480	0.000	0.116	0.407
国家干部/政府工作人员	0.326	0.114	2.860	0.002	0.105	0.547
民营企业主	-0.145	0.078	-1.859	0.032	-0.296	0.006
办事人员	0.436	0.081	5.383	0.000	0.279	0.593
无业人员	-0.256	0.069	-3.710	0.000	-0.390	-0.122
社会责任感						
社会利益优先	0.145	0.041	3.537	0.000	0.065	0.225
社会规范优先	0.143	0.049	2.918	0.002	0.048	0.23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价值观	0.065	0.018	3.611	0.000	0.030	0.100
社会层面价值观	0.038	0.021	1.810	0.055	-0.003	0.079
个体层面价值观	0.058	0.021	2.762	0.003	0.017	0.099
R ²	0.098					

在以参与志愿服务群体的服务小时为受限连续变量的模型中, 男性参与志愿服务群体的服务小时会更少 ($\beta = -0.104$; $\rho = 0.009$)。在0.01的显著

水平上，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对其服务小时没有显著统计影响。年龄效应与决策模型部分相反，中老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群体的服务小时会更长 ($\beta = 0.006$; $\rho = 0.001$)。从职业类型分析，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长的志愿服务时间 ($\beta = 0.405$, $\rho = 0.000$; $\beta = 0.022$, $\rho = 0.007$)，其中以国家干部/政府工作人员身份对其志愿服务时长影响最为显著。就核心变量来看，社会利益优先变量具有正向的统计显著影响 ($\beta = 0.009$, $\rho = 0.012$)；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仅有国家层面价值观的认同对公众的志愿服务时长有正向的统计显著影响 ($\beta = 0.024$, $\rho = 0.004$)。数据显示，志愿服务是否有实际价值对人们的志愿服务参与时长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beta = 0.541$, $\rho = 0.001$)，但是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组织的评价、志愿服务是否对志愿者有提升作用等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上均对其服务时长没有显著统计影响。同时，志愿者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行为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效应。从发起形式分析，单位/学校等、社区居（村）委会、政府部门发起的志愿服务对人们的服务时长均有正向的统计显著影响；与之相对应，个人发起和志愿组织发起的志愿服务则对人们的服务时长没有显著的统计影响（见表 4）。

表 4 双栏模型受限连续变量部分的回归分析

	β 值	标准 误差	z 值	P 值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常数项	-0.040	0.167	-0.240	0.405	-0.364	0.284
性别（参照组：女性）	-0.104	0.044	-2.364	0.009	-0.189	-0.019
城乡居民 （参照组：农村居民）	-0.083	0.024	-3.458	0.000	-0.130	-0.036
年龄	0.006	0.002	3.000	0.001	0.002	0.010
受教育年限	0.032	0.018	1.778	0.038	-0.003	0.067
政治身份（参照组： 非党员/共青团员）	0.154	0.049	3.143	0.001	0.059	0.249
职业（参照组：其他）						
工业制造业工人	-0.002	0.09	-0.022	0.491	-0.177	0.173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0.122	0.067	1.821	0.034	-0.008	0.252
农业从业人员	0.050	0.053	0.943	0.173	-0.053	0.153
专业技术人员	0.022	0.009	2.444	0.007	0.005	0.039
国家干部/政府工作人员	0.405	0.06	6.750	0.000	0.289	0.521

续表 4

	β 值	标准 误差	z 值	P 值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民营企业主	-0.001	0.007	-0.143	0.443	-0.015	0.013
办事人员	0.081	0.009	9.000	0.000	0.064	0.098
无业人员	-0.041	0.016	-2.563	0.005	-0.072	-0.010
社会责任感						
社会利益优先	0.009	0.004	2.250	0.012	0.001	0.017
社会规范优先	-0.005	0.058	-0.086	0.466	-0.118	0.10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价值观	0.024	0.009	2.667	0.004	0.007	0.041
社会层面价值观	-0.008	0.011	-0.727	0.234	-0.029	0.013
个体层面价值观	0.018	0.011	1.636	0.051	-0.003	0.039
内部功利性因素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可以获得个人发展	-0.104	0.068	-1.529	0.063	-0.236	0.028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						
政治参与效能感	0.041	0.008	5.125	0.000	0.025	0.057
政治社会参与行为						
社会参与行为	0.114	0.019	6.000	0.000	0.077	0.151
政治参与行为	0.144	0.021	6.857	0.000	0.103	0.185
外部功利性因素						
志愿服务能够 取得实际成效	0.541	0.165	3.279	0.001	0.221	0.861
外部非功利性因素						
外在机制评价	0.023	0.034	0.676	0.249	-0.043	0.089
内在机制评价	0.041	0.023	1.783	0.037	-0.004	0.086
志愿服务发起形式						
个人/志愿组织发起	-0.012	0.053	-0.226	0.410	-0.115	0.091
工作的单位/学校发起	0.529	0.174	3.040	0.001	0.191	0.867
社区居(村)委会发起	0.541	0.149	3.631	0.000	0.252	0.830
政府部门发起	0.160	0.034	4.706	0.000	0.094	0.226
R^2	0.149					

（二）对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进一步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文通过建立双栏模型验证了人们的社会优先意识对其志愿服务参与的正向影响效应，验证了“社会责任感假设”（假设1）。同时，从双栏模型分析可以发现，人们对国家发展层面、公众义务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样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统计上的显著效应，但是人们对社会层面价值观的认同则对其志愿服务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部分验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假设”（假设2）。另外，本文通过对受限连续变量模型的分析发现，志愿者持续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志愿服务具有外部功利功能，也就是通过志愿服务参与的确可以取得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实际功效，验证了假设3（外部功利假设）。对于假设4（外部非功利假设），也就是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组织的认同和评价对其志愿服务时长的影响，则没有通过0.01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不同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发现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参与的持续性并不受志愿服务参与是否对志愿者本身有功利性价值的影响，也就是说假设5（内部功利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这和以往以青年群体为总体的研究结论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内部非功利假设（假设6）得到验证，表明志愿者个体的政治社会参与行为、参与效能感对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除了上述核心变量，研究发现政府机关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比其他群体人员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同时，从发起形式分析，政府部门、单位/学校、社区等发起的志愿服务对人们的志愿服务时长均有正向的统计显著影响，说明我国志愿服务的发起有典型的组织动员特征。

四、基于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分析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就当前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来看，社会责任感、国家层面与个体层面价值观对公众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有着显著影响。在志愿者中，志愿服务参与的实际效能评价与志愿服务的参与持续时长高度相关。但同时，研究也发现在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中，以单位和政府部门组织动员形式开展的志愿服务有较好的持续性，但是个人或者志愿组织自发型志愿服务参与的持续性较差。

结合上述研究发现，笔者认为，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提升志愿服务组织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正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正逐步形成，基层的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志愿服务模

式创新等正在各地实践中不断完善,补齐基层的志愿服务短板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自发性不足、志愿服务持续性较低、部分志愿服务效果不显著等现象,也成为制约通过志愿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瓶颈。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水平的建议。

首先,应当进一步健全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机制,构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层村居委会干部、在校青年群体等,志愿服务发起形式也以单位、学校、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动员型参与为主,自发型的志愿服务较少。如将志愿服务参与分为组织动员式参与和公众自发式参与,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形式则主要是前者。组织动员式的志愿服务参与一般以政府部门、学校、基层自治组织为主导,志愿服务项目的设计与执行是以政府、单位等为主体自上而下展开的,公众作为被组织的角色,其参与程度较低。^①在这种组织动员参与模式中,组织动员者以其行政权威主导了参与的各个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在社区动员式参与活动中,参与者有明确的个人利益诉求或期望,一般对社区居委会有着一定的利益依赖或是希望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得到一定的认同与回报。因为社区参与能够给当事人带来物质或是精神上的回报,所以参与的自主性较差,对社区参与的目标期望值不高。”^②

与组织动员式的志愿服务参与相对应,公众自发式参与是以公众个体和社会需求为起点,通过公众自行组织发起的志愿服务参与。具体而言,公众通过自愿组织形成自下而上的志愿服务模式,有助于建立良性、充分互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社会成员的自组织,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避免在组织动员式的志愿服务中出现的社会资源错配。^③并且,在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志愿服务参与,能使志愿者在最大程度上认同其志愿服务的意义与价值,强化对志愿者身份的认同,有效实现志愿服务队伍的维护和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有助于增强社会整体凝聚力。

其次,应当进一步强化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① 朱晨光:《关于城市社区管理公众参与机制的若干思考——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学理论》2009年第5期,第116~117页。

② 向德平、王志丹:《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第38页。

③ 王诗宗、杨帆:《政府治理志愿失灵的局限性分析——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多案例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84~195页。

通过内化正向价值理念促进志愿服务的外在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从志愿服务情况看，公众的参与水平仍有待提升。研究表明，公众志愿服务参与水平与个体的价值观和社会认同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个体对社会责任感和以国家理想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提升，其志愿服务参与水平也不断上升。所以，要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水平，必须从多方面发力，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其中，尤其应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社会优先和集体主义价值观。

最后，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制度，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大胆探索参与新渠道，在经验总结中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各项法律与政策。从当前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实际情况来看，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性略显不足。为促进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可持续性，应当提高志愿服务项目的规划水平和项目推动机制，增强社会公众在志愿服务项目立项、执行、评估的全过程参与，提高一般社会公众和志愿者对志愿服务项目的知情权、参与权、评估权，完善志愿服务组织者和志愿服务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渠道，健全反馈机制。同时，在项目规划中，应当充分考虑志愿服务项目与公众需求的匹配程度，注重实效，提高公众参与的效能感。在组织过程中，应当重视建立志愿服务者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志愿服务专业化队伍建设。在坚持政府的主导性、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完善志愿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多方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共资源使用和分配机制，完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实现政府主导和社会协同、公众响应的志愿服务良性互动格局。

总之，志愿服务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实质是社会生活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体现出个体对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有机结合。同时，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体现出个体的社会意义的实现，在为他人服务中实现了个体的社会价值。社会成员在参与过程中，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扩展了社会交往圈，通过志愿服务平台和渠道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因此，志愿服务参与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共识、提升社会认同的重要功能。在社会治理中，应当广泛动员各方力量，搭建公众志愿参与的平台，凝聚社会公共服务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水平，使志愿服务成为实践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载体。

（责任编辑：温莹莹）